

•王雲五主編•



梁啟超與近代報業

著 賴光臨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賴光臨著

梁啟超與近代報業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創始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創刊之初視字數多寡分爲單號及雙號兩種，五十八年七月起增加特號，迄六十八年十二月底共出版二二五一本，其中單號六五七本，雙號九〇九本，特號六八五本。除六十三年三、四兩月因紙張缺乏暫停外，每月發行十本至二十本不等。

本叢書爲王雲老所創，其選材與介紹新知倣自英國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及家庭大學叢書（Home University Library），以廉價普及爲主。今雲老雖已仙逝，不復主編本叢書，本館仍一本雲老遺志，繼續出版，按月發行，並力求革新內容，改進印刷，以副讀者愛護本叢書之雅意。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謹識

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一日

王洪鈞教授序

任教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的賴光臨先生以所著「梁啟超與近代報業」一書草稿，授我作序。

當我讀完全稿，開始執筆時，最先湧伏在腦際的思想，不是對著作的評價，而是對作者的欽仰。

賴光臨先生作學問之苦，恐怕許多幸運的青年學人皆難想像。在我擔任政大新聞系主任近十年期間內，賴先生始終協助我擘劃系務，他必須每天坐在辦公室裏為川流不息的學生們解決問題，還要準備授課。唯一的自由時間是從黃昏到天明，子夜燈前萬籟俱寂之際，正是他鑽研學問之時。為了找第一手的資料，中央研究院是他必履之地；風裏雨裏，常見他打著一把舊傘在木柵南港間往返。

賴先生是屬於認真的讀書人一型。他很厭惡用剪刀和漿糊寫書。因此，當他自己從事研究著述時，便充份表現了這種規規矩矩方方正正的作風。尤其是他所選擇的題目是新聞的史學範圍，研究對象又是中國近代報史上的巨擘梁啟超先生(西人嘗喻梁先生為Prince of Chinese Press)，凡此更需要嚴肅而認真的作學問的態度。

本書共分七章，除緒論和結論之外，餘者皆需窮千百冊頁之報章，方能擷其精華，析其背景。其第三章，大抵已將任公所創辦的報刊雜誌作中庸的評價。就本書主題而言，第四、第五、及第六三章分述任公之報業思想、對報業之貢獻及其言論之影響，更能表現作者對梁啟超先生在中國

近代報業史上的估價。

近代的中國，從科學到科學是號稱五千年歷史中重要的一變。站在中國人的本位上，面對著變化而有活力的西方文明，維新革新，何去何從，每個有強烈責任感的讀書人皆不能免於衝動與矛盾。任公一生所言所行充份盡其所能，也充份表現了他所不能。他個人的歷史可以反映出中國現代化的轉變中許多讀書人的遭遇。尤其是任公的辦報生涯，使新聞系學生讀之，可以高歌，可以垂淚。

梁任公的報人地位無可撼搖。任公自己該未曾料到他在報業歷史上的貢獻將歷久彌新。或以任公沒有給後世留下一家有悠久歷史、宏偉規模的報紙，堪列世界報業之林。就像作者在本書結論一章內便會引以爲憾，並指出了三個原因：一爲經濟之不克自立，一爲人力之單薄，一爲梁任公的辦報興味始終不缺其政治的興味。我自然尊重作者的觀點，深深感到政治與辦報，一如辦學與研究，兩事古難全。不過，從另一角度去看，今之報紙與政治相距幾希？任公以「救國爲己任」，「言論覺天下」兩者實一而二，二而一，若不從功利的出發點去看，任公可謂求仁得仁。事實亦然，報紙必有其時代性，果能在其時代善盡其責任，猶勝無刺無痛的百年老鋪子。

新聞學術，近年已漸抬頭，著作迭出。言史者，特別是以人物爲中心者，賴光臨先生此書之真實、深入、具有極高啓發性，爲鮮見中的一冊。

王洪鈞序於臺北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十七日

徐佳士教授序

我非常幸運有機會在本書出版之前拜讀全稿。作者賴光臨先生要我寫一篇序，我不相信自己能够資格來序任何著作，這篇短文只是我的讀後感而已。

讀完本書後我有一個感覺：作者不只是寫了一本敘述中國報業一個重要發展階段的史書；他還完成了一件更加重要的工作——他藉剖析一個歷史人物的業績，對新聞事業在現代社會中的功能與責任，以及理想主義的新聞理論，都有適當的發揮。所以，在新聞科系教科書缺乏的今日，作者不僅僅為報業史課程提供了一份好教材，而且為新聞學概論一類課程增加了一本優異的參考書。

在校園之外，這本書的價值也是很顯著的。

梁啟超是個人報業（Personal Journalism）時代的一個代表人物。「個人報業」無論中外雖有時不免淪為政爭的工具，但是假使主持者富於理想而又膽識兼具的話，他的個性會使報紙的活力充沛。他的新聞報導固然可能失去平衡，但在評論與報格方面必然光芒四射，有如時代的號角，引導社會向前邁進。梁啟超就是這麼一個人物。

我們讀美國或英國的報業史，也會發現很多和梁啟超類似的報人。所謂「新報業」出現前的歷史發展過程，也不過就是Henry J. Raymond, James Gordon Bennett, Horace Greeley,

Edward Lawrence Godkins , Charle Dana , John Walter II , C.P. Scott , T.P. O'Connor和Lord Northcliffe……等人的奮鬥故事而已。

自由世界那種可愛的「個人報業」時代已經遠去，報紙變成了一種集體作業。科學技術和企業組織應用於新聞事業之後，固然強壯了報紙的肌肉，但却浸蝕到它的靈魂。領導的原則，在大多數情形下，已不再是梁啟超和 Greeley 等時賢的理想主義，而是像 Samuel L. Newhouse 或 Roy Thomson 之類「大王」的商業考慮了。

在這麼個時代，報業領導人士和從業人員，細心回顧一番報人梁啟超的事業，必然是件有益的事。

徐佳士 民國五七年三月

自序

梁啟超先生爲中國近代史上之卓越人物，以言論學術著稱於世，一生事業多采多姿，而報業生涯尤具特色。

然梁氏逝世迄今四十年，求一研究梁啟超與報業關係之著作，仍屬鮮見。此不僅爲中國報史之缺失，即研究梁啟超一生行誼，亦爲一項遺漏，似有待於彌補。

上述因素，乃激發筆者探討之興趣，並鼓勵拙作之出版。筆者學識謬陋，欲對梁啟超與近代報業之關係作一剖析評價，必多疏失。然意在拋磚引玉作一嘗試，就教於高明焉。

拙作內容計分七章：一爲前言，二爲分析梁啟超從事報業之背景。時報紙被視爲「莠民賤業」，士大夫階級何以自貶身份操持斯業？蓋有由焉。三爲敘述梁啟超對報業之經營，藉以見其當日主持報刊之情況及甘苦。四爲論述梁氏之報業思想，從散見於時務、清議、新民、國風等報之有關文字、作抽繹整理。梁氏之報業思想，與世界新聞學發展理論悉相符合，指出理想報業之正確發展方向，仍值吾人重視。五爲探討梁啟超對報業之貢獻。就其舉筆大者言，如樹立報人風範，創立報紙風格，改進報刊內容，革新報章文體，均有其不可磨滅之勳績。六爲梁啟超言論之影響。有關此類資料，見於先賢時人之傳記，回憶錄，文存及函札中，特予蒐集排比，作具體之闡述。七爲結論。

本書承王師洪鈞、徐師佳士指導並於百忙中抽暇賜序，衷心感激。研究期間，曾獲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之補助，而臺灣商務印書館賜予出版，並此申致虔誠謝意。

賴光臨 民國五七年三月於木柵

目

錄

王洪鈞教授序
徐佳士教授序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梁啟超從事報業之背景分析	一
一、國勢之背景	一
二、社會風氣之蔽塞	七
三、認識報刊之功能	十
四、早期維新人士與傳教士之影響	十三
第三章 梁啟超經營之報刊	十六
一、中外公報	一
二、時務報	四
三、清議報	五
四、新民叢報	七

五、新小說	四七
六、政論報	五一
七、國風報	五四
八、庸言報	五八
九、大中華及其他	六〇
梁啓超之報業思想	
一、理想之報章藍圖	七〇
二、報館之天職	七四
三、思想言論出版三大自由	八〇
梁啓超對報業之貢獻	
一、厘訂論說記事準則	九〇
二、創新報章文體	九三
三、樹立報人風範	九八
四、改進報刊內容	一〇二
梁啓超言論之影響	
一、各報刊發揮之直接影響	一一〇
第六章	

第七章 結論	一一八
二、言論之間接功效	一一九
三、對知識份子之影響	一二一

第一章 緒論

我國新聞事業之發軔，可上溯及於商周之世，（註一）近代報章之創刊，則濫觴於清季咸同之間。（註二）

咸同之際，報紙被視為「洋商一種營業」（註三），於社會初無若何之關係。開設報館者固以牟利為目標；主持筆政者，則以省事為要訣。蓋優秀分子，大都醉心科舉，無人肯從事新聞事業，惟落拓文人疏狂學子，或借報紙以發抒其抑鬱無聊之意興而已。（註四）

故自同治末年至光緒中葉，二十餘年之間，新聞事業年復一年，絕鮮進步。（註五）而於全國社會，亦無纖毫之影響。（註六）

自甲午（一八九四年）一役，決決大國，見辱於扶桑三島，如雷霆旋頂，轟然震憾，士大夫始漸驚起。外脅於強敵侵凌，國亡無日；內感於上下壅蔽，人心頑固。至是亟亟於圖舍舊謀新，投注其心力於報章。「革新救亡，新報紛起；論政記事，規模漸具」。（註七）中國近代新聞事業，與焉揭開新頁。

而清季士大夫從事報業者，則當推梁啟超為巨擘。

梁氏於乙未（一八九五年）主持中外公報，實為從事報業之開始。中外公報刊期不長，影響尤小，梁氏在該報日為一數百字之短文，其自我批評謂：「其言膚淺無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顏

」。（註八）唯梁氏文字受人賞識即始於此時，翌年二月，因受邀赴滬，參與籌創時務報。

值得注意者是，梁氏熱切之辦報心志，亦於辦中外公報後決定。其言曰：

「其年十一月，強學會遂被封禁，鄙人服器書籍皆沒收。流浪於蕭寺中者數月，益感慨時局，自審舍言論外未由致力，辦報之心益切」。（註九）

故中外公報內容雖簡陋，但對梁啟超言却至足重要。

丙申年（一八九六）梁啟超與黃遵憲、汪康年創辦時務報，以言論鼓吹改革，發刊之後，風靡海內，銷行至萬餘份，舉國趨之，如飲狂泉。梁氏首著「變法通議」，亟言不變法之害，以抨擊清廷秕政。而救敝之法，則曰：

「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註十）

一文刊出，遠近煽播，張之洞竟因以憂慮，「必至匪人倡爲亂珍」。（註十一）

戊戌（一八九八年）政變發生，啟超逃亡日本，十一月創清議報。「倡民權，衍哲理，明朝局，厲國恥」，（註十二）皆爲特色，而對慈禧、榮祿、剛毅輩，則明目張膽攻擊。梁氏言論較時務報尤爲奔放，報章內容亦較前優勝。

壬寅（一九〇二年）復組新民叢報，從灌輸常識入手。旋另創新小說，欲以小說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以作新國人。時承掌變之後，「清延創痍未復，故態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憤慨」

。（註十三）故新民報中言論，日趨激烈。破壞、暗殺、排滿、革命無一不視為救時之良藥。

梁氏根本主張曰：「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國羣治之現象，殆無一不當從根柢處摧陷廓清，除舊而布新者也。」（註十四）

其鮮明之革命口號曰：「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註十五）

梁氏指出國人所最缺乏而須採補者，為公德，為國家思想，為進取冒險，為權利思想，為自由，為自治，為進步，為自尊，為合羣，為生計能力，為毅力，為義務思想，為尚武，為私德，為民氣，為政治能力。作者抱滿腔之血誠，用筆鋒常帶情感之健筆，指揮無敵之歷史例證，組織成使人鼓舞，使人掉淚，使人感激奮發之文章。（註十六）

癸卯（一九〇三年）冬，梁氏思想轉變，不復言種族革命，專言政治革命。與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生論戰，其影響力之衰退自此始。

丁未（一九〇七年）經營政論，旋停刊。庚戌（一九〇九年）創辦國風，昌言「矢志必潔，而稱物惟芳；託體雖卑，而擇言近雅」。（註十七）襲詩經之義，達風人之旨。時國內士大夫從事立憲請願運動，梁氏發抒言論為之指導。

民元，創刊庸言，以「言之樸雜，至今而極，而其去治理者愈遠」。（註十八）因有庸言之作。

總計梁啟超一生，主持之報刊凡八九，據徐佛蘇氏作保守估計，其著與述兩者總和，達千四

百萬字。（註十九）古今人著述之多，範圍之廣，無有出其右者。

梁氏之言論，於廿年來學子，幾無不影響。唯他政治思想屢變，故影響力之大小強弱，亦隨之不同。辛亥之前可概括為兩期：癸卯以前為影響力最大時期，此一時期，他之言論趨重突破現狀，以具有魔力之健筆，撰聲情激越之文字，青年人受其鼓動影響最大，並啓發革命思想。癸卯冬以後，至民國創建，為影響力低落時期。時宣傳革命之報章蓬勃創刊，聲勢浩大，人心所趨，「排滿革命」幾成為「無理由之宗教」。（註廿）。梁氏反對革命主張，不順治輿情，言論影響力低落，然發生反宣傳功效，却予革命以間接之助力。入民國後，梁氏實際參與政治。民初政局混濁，及至袁世凱「帝制議興，九字晦盲，梁氏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全國已死之人心，乃振盪昭蘇」。（註廿一）之後，軍閥稱雄，梁氏失望於政治，轉而獻身教育，以言論指導青年，提倡學術。其價值甚大，而收效則微。

梁啟超從事報業期間，西方報業日形發達，倫敦泰晤士報，儼然執世界報業之牛耳。梁氏於西方報章種類之多，內容之繁頗，言論之勢力，久所心折。（註廿二）旅居東瀛，得讀日文書籍報章，其對報業之認識，自更為提高。其後遠遊澳美兩洲，親身體察，聞見廣博，於西方思想、言論、出版自由，輒心嚮往之。故啟超孕育之報業思想，頗順應世界進步潮流；對報章之建言，尤具真知灼見，足可供今後中國報業發展之指導，其對報業之貢獻，有足多者焉。

梁啟超一生，多采多姿，他為一報人，為思想家，為教育家，為史學家，為文學家，而報人

生涯，尤具特色。本文純就其新聞事業之一面，作一研究，就梁氏從事報業之背景，報刊之經營，報業之思想，對近代報業之貢獻，與言論所發揮之影響，分章探討。主要目的，在瞭解梁啟超與近代報業之關係，從而見其在中國報業史上之地位。

第一章 註釋

註一：秦理齋「中國報紙進化小史」云：「劉歆與楊雄書曰：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遞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謡歌戲。大抵所傳詩歌國語國策，要亦當時新聞之流亞」。

(「最近之五十年」—申報五十周年紀念特刊)

註二：香港中外新報出版於咸豐四年（一八五八），上海申報創刊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香港循環日報創刊於同治十二年冬（一八七三），均為我國早期現代報業。

註三：雷瑨「申報館之過去狀況」（輯「最近之五十年」）

註四：同右

註五：同右

註六：梁啟超「清謬報一百冊祝辭」（飲冰室文集第三冊）

註七：袁昶超「中國報業小史」成舍我先生序

註八：梁啟超「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與將來」（文集第十一冊）